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J. W. 狄雍著

霍韜晦譯

佛教與數論的關係

在「佛陀」一書的初版和二版中，奧頓堡否認佛教與數論哲學有任何相關，（前引書，頁一〇〇，註一），但畢爾諾夫在他的「印度佛教史概論」中，却早已論及佛教與數論的關係；他注意到，反映在十二因緣說中的佛教的基源存有論（Primitive ontology），與數論哲學十分類似（頁五一一）。歐比力特·韋伯（Albrecht Weber）亦試圖說明數論的「諦」（tattva）與佛教的「因緣」（nidāna）是同一的東西^⑮。但馬克思·繆勒則堅決拒絕在數論和佛教之間有任何相似^⑯。然而，一八九六年，海曼·耶

高比（Hermann Jacobi, 1850-1937）^⑰所寫的一篇文章，却使這個問題的論爭變得尖銳起來。耶高比相信：「因緣」的概念是以古典數論以前的體系為基礎的，當時的數論還未知道「三德」（即薩陲 Satva，羅闍 Rajas，他摩 Tamas 三德——譯者）。此一體系後來由佛陀之師阿羅多·加拉瑪（Aśāda Kālāma）所授。有關阿羅多的教義，在馬鳴（Aśvaghōṣa）的「佛所行讚」（Buddhacarīa）的第十二篇中即有展示。奧頓堡在「佛陀」一書的第三版中回答耶高比的理論（一八九七，頁四四三—四五五）。同時，他重新研究佛教與數論的關係問題。他的研究，見「佛教研究」（Buddhistische Studien, ZDMG, 52, 1898, pp. 681-694 = Kleine Schriften, II, pp.

957 - 970) , 及一九一五年他出版的一本有關奧義書的書 (Die Lehre der Upanishaden und die Anfänge des Buddhismus, 「奧義書的教理與佛教的起源」1915, 第一版, 1923, pp. 254 - 275) , 和一九一七年他發表的一篇數論體系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 他明白地表示佛教是受古典數論以前的體系影響¹⁸。

爲了對應奧頓堡在「佛陀」一書中的異議, 和辛納的意見¹⁹, 耶高比寫了第二篇論文來維護他的觀點。在這篇文章中, 他的立場基本未變²⁰。

此外, 李察·加比 (Richard Garbe, 1857 - 1927) 亦相信佛教是受數論影響, 但是, 他認爲這影響並非來自古典期以前的數論, 而是來自迦毘羅 (Kapila, 據傳爲古典數論之開創者, 其年代據 R. Garbe 氏說, 是在公元前六世紀, 但近人未盡同意——譯者) 的系統; 根據他的想法, 迦毘羅的系統較之佛教更古老²¹。

佛教依賴數論觀念, 爲這一主張辯護的學者還有幾位, 如約瑟夫·多爾曼 (Joseph Dahmann, 1860 - 1930)²², 李察·畢薛爾 (Richard Pischel, 1849 - 1908)²³ 等。而下判斷更小心的有 A. B. 祈斯 (A. B. Keith, 1879 - 1944)²⁴。蒲仙雖不接受數論的影響, 但却並未花工夫來說明他的觀點²⁵。最近柯殊 (Horsch) 斷然表示: 所有企圖從原始數論 (Ursāmkhya) 導出佛教哲學的嘗試都必須被認作「不成功」, 但有關於這問題的最後的決斷實在尙未能說出²⁶。

¹⁵ Die neuesten Fors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s Buddhismus, Indische Studien, III, 1853, pp. 131 - 133.

¹⁶ 參看 Chips from a German workshop, I, London, 1867, p. 226. 此語原由奧頓堡「佛陀」一書所引 (第二版, p. 100, note 1)。

¹⁷ Der Ursprung, des Buddhismus aus dem Sāṅkhya - yoga (NGGW, 1896, pp. 43 - 58 = Kleine Schriften, II, Wiesbaden, 1970, pp. 646 - 661).

¹⁸ Zur Geschichte der Sāṅkhya - Philosophie, NGGW, 1917, pp. 218 - 253 = Kleine Schriften, II, pp. 1423 - 1458. Qu Buddhism and Sāṅkhya, see pp. 1445 - 1452.

¹⁹ A propos de la théorie bouddhique des douze Nidānas, Mel-

anges Charles de Harlez, 1896, pp. 281 - 297.

²⁰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buddhistischen Philosophie zu Sāṅkhya - Yoga und die Bedeutung der Nidānas, ZDMG, 52, 1892 = Kleine Schriften, II, pp. 662 - 676.

²¹ Einleitung zur Übersetzung des Sāṅkhyatvakaumudī, München, 1892, pp. 517 ff.; Die Sāṅkhya - Philosophie, 1894, pp. 3 - 5, 14 - 23; Sāṅkhya und Yoga, 1896; Die Sāṅkhya - Philosophie, 2, Auflage, 1917, pp. 6 - 18.

²² Nirvāṇa, Berlin, 1897; Buddha, Berlin, 1898; Die Sāṅkhya - Philosophie, Berlin, 1902.

²³ 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 Leipzig, 1906.

²⁴ The Sāṅkhya System, London, 1918, 2nd. ed., 1924, pp. 24 - 33; 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 Oxford, 1923, pp. 138 - 143.

²⁵ 參看 B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1898), p. 82; Indo-européens et Indo-iraniens, Paris, 1924;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1936, p. 310; Le dogme et la philosophie du bouddhisme, Paris, 1930, p. 182.

²⁶ Buddhismus und Upanishaden, Pratiḍānam, 1968, p. 475.

佛教與瑜伽的關係

赫恩是主張佛教有受瑜伽學派影響的第一位學者²⁷。由此出發, 佛教與古典瑜伽, 或與古典期以前的瑜伽的關係, 即常有討論。一八九八年, 蒲仙對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的定義作出反應, 他在「佛陀」一書中委出一章來討論佛教瑜伽 (Buddhist Yoga)²⁸。辛納亦詳細研究過瑜伽對佛教的影響, 但他未能使其他學者信服影響佛教的瑜伽是它的古典形態²⁹。他的「佛教的起源」 (Origines Bouddhiques) 書中, 他得到一個異常的結論: 說佛教是受某種毘濕奴派瑜伽 (Viṣṇuīte Yoga) 的影響, 這種瑜伽比敘事詩中的瑜伽還要古老, 而且亦未與數論結合³⁰。

蒲仙和貝克 (Beckh) 曾經強調瑜伽在佛教中的重要性。蒲仙宣稱, 佛教在本質上即是純粹的瑜伽派, 主張涅槃的神秘主義³¹。同樣, 海曼·貝克 (Hermann Beckh, 1875 - 1937) 亦表示

：「佛教徹頭徹尾祇是瑜伽，除此之外更無別物。」(Der ganze Buddhismus ist durch und durch nichts als Yoga) ②奧頓堡承認瑜伽在佛教中的重要性，但却不願意考慮佛教是瑜伽的一支 ③。作為研究瑜伽或佛教的文獻目錄，我們必須參攷蒲仙的各種著作 ④。不過蒲仙並未提及貝克的「佛教」(Buddhismus, I - II, 1916 ⑤)和祈斯的「佛教哲學」(Buddhist Philosophy, 1923)中有關佛教與瑜伽的一章(pp. 143 - 145)。

- ② Geschiedenis etc., I (1882), pp. 366 - 405.
③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pp. 82 - 93.
④ Bouddhisme et Yoga, RHR, 42, 1900, pp. 345 - 365; Nirvāṇa, Album Kern (Leiden, 1903), pp. 101 - 104.
⑤ Origines bouddhiques, AMG, B. V., tome 25, 1907, pp. 115 - 158.
⑥ Le bouddhisme et le yoga de Patanjali, MCB, V, 1937, p. 227.
⑦ Buddhismus, II, Berlin und Leipzig, 1916, p. 11.
⑧ Die Lehre der Upanishaden (1923), pp. 275 - 288.
⑨ Le dogma et la philosophie du bouddhisme (1930), pp. 182 - 184; Le bouddhisme et le yoga de Patanjali, MCB, V, p. 223. n. 1.
⑩ 最新之版本為一卷本 (Stuttgart, 1958)。

阿育王碑文、及辛納對阿育王時代佛教的看法

當原典正紛紛被歐洲學者們校訂、翻譯、及研究解釋上的各種問題時，印度發現了各類碑文，並被編錄起來，其中佛教紀念碑亦被記述、及進行註釋。在這些碑文之中，對史家來說，阿育王 (Aśoka) 碑文是最重要的。在這裏我們不必敘述遠至一八三四年以降詹姆士·普林斯普 (James Princep, 1799 - 1840) 所首先嘗試的讀解工作。佛教學者中，畢爾奴夫是第一個研究阿育王碑文的，他說在這些碑文題銘中，包括着數量相當可觀的屬於真正的佛教教義與語言的字眼和句子 (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法譯法華經」p. 653)。畢爾奴夫對碑文的精細考查收在他書中 (即「法譯法華經」) 的附錄十 (pp. 652 - 781)，結果使很多章

節獲得更充分的解釋。他的工作後來由赫恩繼承，赫恩在一八七三年發表了一篇題為：「南方佛教編年與佛教徒阿育王紀念碑」(Over de Jaartelling dar Zuidelijke Buddhisten en de Gedenkstukken van Aśoka den Buddhist, Amsterdam, 1873) 的論文。跟着在一八七四年，巴特對赫恩的這篇著作寫了一篇長評 ②。

一八七七年，印度考古調查局局長阿歷山大·斯寧涵 (Alexander Cunningham, 1814 - 1893) 將軍，他在一八七〇年已出任該職，出版「印度碑銘全集」(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第一卷，阿育王碑文已全面收輯在內。但新的碑文續續發現，一八七九年，辛納寫了一篇長文評論斯寧涵的版本，同時自己準備編纂新版，在「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上連載。這些碑文後來被結集成兩卷出版 (Les inscriptions de Priyadasi, 「毘耶陀斯碑文集」Paris, 1881 - 1886。(由於辛納對中古印度語有相當廣博的知識，使他對碑文的語言和文法的研究都有重要貢獻。一八八九年，辛納在一篇論文中替碑文研究建立更廣大的視野 ③)。以這些碑文為基礎，辛納描述了一種大眾化的佛教，它重視人、天界的幸福多於涅槃，亦不想對因果連鎖作深沉的思考。據他認為，佛教在那時候由於高尚的倫理法規而鼓舞起一種廣泛的大眾運動，以對抗婆羅門教的祭儀主義及同時代同一形態的印度教。巴特不同意辛納的結論，他指出：教理思考在佛教中起源極早 ④。蒲仙則表示：佛教自最初的時候始，即不僅是大眾的宗教，同時亦是宣揚救度與斷欲的僧團 ⑤。至於奧頓堡，則更完全摺斥辛納的觀念，他在「佛陀」一書的第二版的緒言中表示：佛教的真正性格，並非由在俗的信者實證，而是由以涅槃為鵠的佛教僧人。奧頓堡還抗議辛納把佛教還原為印度教的一支，他指出佛教的基本觀念，例如人存在的痛苦與出離的二元構造，業的教義，和斷欲的生活方式，都是從吠陀文化傳留下來的 (「佛陀」，第二版，(1890, pp. iii - viii)。

辛納的見解，雖然不為這些優秀的學者們所接受，但他對阿育王時代佛教的看法，在研究方面繼續產生一種潛伏性的影響，却並非沒有理由。阿育王碑文誠然是無法提供公元前三世紀的佛

教的全貌，但它們在研究當時大眾佛教方面及佛教對在俗信者的影響方面，却有極大的價值。佛教並非祇是僧人及斷欲者所崇奉的教法，同時亦是印度多個世紀以來信徒數以百萬計的宗教。蒲仙「佛教」(Bouddhisme, London, 1898)一書的成就之一，就是強調爲了更好地了解佛教在印度宗教史上的位置，必須考慮及大眾佛教與僧院佛教兩方面。

在辛納的「毘耶陀石碑文集」之後，新的碑文繼續出版，亦有對它們的解釋文章。辛納自己寫了幾篇論文：紀柯·畢拿(Georg Bühler, 1837-1898)和凱歷克·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亦有重要貢獻。一九二五年，愛肯·胡爾茲(Eugan Hultsch, 1857-1927)刊行「阿育王碑文集」(The Inscriptions of Aśoka)新版。他這本書至今仍然是標準的版本，但近年來已有很多新發現和新解釋公諸於世，因此一個全新版本的印行便成爲迫切的題望。劍橋大學的K. R. 諾曼(K. R. Norman)從事此項工作多年，我們希望在這十年內能看到他的版本出版^{④0}。

^{③6} Œuvres, III, 1917, pp. 131-139.

^{③7} Un roi de l'Inde a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Aśoka et le bouddhisme, Deux Moades, 1^{er} mars 1889 (tome 92), pp. 67-108.

^{③8} Œuvres, II, 1914, pp. 55-57.

^{③9}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London, 1898, pp. 31-33.

^{④0} 文獻目錄請閱· M. A. Mehendale, Aśokan Inscriptions in India (A Linguistic Study together with an exhaustive Bibliography), Bombay, 1948.

佛教的紀念碑與碑銘

自一八七一年以來，先後由靳寧涵和詹姆士·畢爾傑斯(James Burgess, 他在一八八五年繼靳寧涵擔任局長)負責出版的印度考古調查局年報，每期都收錄很多佛教考古學的資料。對佛教研究特別有重要性的，是靳寧涵的一本書「婆呼圖佛塔」(The

Stupa of Bharhut, London, 1879 譯者按：婆呼圖及下文之散溪均爲地名，相傳阿育王曾建塔八萬四千所，以供養佛陀舍利，此兩地即其一)。散溪(Sānc̥hi)的紀念碑亦已由詹姆士·斐嘉信(James Fergusson)在他的「樹木與蛇的崇拜」(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London, 1868)中予以研究。不過，他的著述乃至梅西(F. C. Maisey)的「散溪及其遺跡」(Sānc̥hi and its Remains, London, 1892)都不能使人滿意。一九〇二年。畢爾傑斯的繼任人約翰·馬歇爾爵士(Sir John Marshall 1870-1958)繼續進行靳寧涵最初着手的工作——「比爾沙佛塔」(The Bhilsa Topes, London, 1854)他的「散溪指南」(A Guide to Sānc̥hi, Delhi, 1918; 2nd ed., 1936)是他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在當地工作的成果。一九四〇年，他和富除爾(A. Foucher, 1865-1952)和馬尊達(N. G. Magandhar)兩人終於出版了華麗的「散溪遺跡」(The Monuments of Sānc̥hi)，在裏面，馬歇爾研究紀念碑和散溪的美術，富除爾研究雕刻品的意味，而馬尊達則研究碑文^{④1}。

要列舉與佛教有關的碑銘金石學的及考古學的重要發現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八九五與一八九六年間在尼泊爾發現的阿育王碑文，則必須提及。首先被發現的，是一根在尼基利華村(Nigliwa)附近的柱子，上面刻有拘那舍佛(Konākamana)佛塔的敘述；跟着被發現的，是另一根在距離帕德利亞村(Paderia)十三英里處，由阿育王於即位後二十一年在藍毘尼園(Lumini)祝佛聖誕時所建造的柱子，這兩根圓柱的發現，和結果造成了附近迦毘羅衛城(Kapilavastu)遺址與拘留孫佛(Krakucchanda)佛塔的發現，正如巴特所說，確定了佛陀的傳說較之從前所想像的更爲古老^{④2}。這些發現不能證明收容在佛陀傳說中的歷史的真實性，但却使辛納·赫恩從前所作的認爲迦毘羅衛城不過爲一神話場所，並無現實根據的想法成爲不可能。早於一八七〇年，靳寧涵相信他已經重新發現佛陀入滅的地方，說是在哥羅坡(Gorakhpur)以東三十四英哩的迦斯亞村(Kasia)附近；但學者對此說抱有懷疑。文善·史密夫(Vincent A. Smith)寫過一篇有關

「迦斯亞近郊遺跡」(The Remains near Kasia, Allahabad, 1896) 的論文，即拒絕接受靳寧涵的主張。直到一九一一年，纔由喜羅難陀·沙斯特里(Hirananda Shastri)在一節他所發現的碑文中證明靳寧涵的認許是正確無疑的^{④③}。

^{④①} 對在印度的考古學工作作全面考察須待至一九三八年。參閱 Revealing India's Past. A Cooperative Record of Archae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India and Beyond. London, 1939.

^{④②} Découvertes récentes de M. le Dr Führer au Népal, Œuvres, IV, pp. 323-335.

^{④③} 參看 J. Ph. Vogel, Op het voetspoor van Boeddha, Harlem, 1934, p. 72.

中亞細亞佛教抄本的研究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在中亞細亞方面開始有一連串的重要的佛教抄本的發現。俄羅斯駐克什噶爾(Kashgar)領事尼古拉茲·費多羅維奇·彼得洛夫斯基(Nikolaj Fedorovich Petrovskij, 1837-1908)^{④④}把一些不同文字的抄本送到彼德堡的些爾傑·奧頓堡(Serge Oldenburg, 1863-1934)那裏。奧頓堡在一八九二年發表了一頁以龜茲文(Kuchean)寫成的抄本的影印版；跟着在一九〇〇年，安尼斯特·雷曼(Ernst Leumann, 1859-1931)將之轉錄(transcription)，並另外增加一頁^{④⑤}。此後數年間，奧頓堡發表了好些從克什噶爾出土的梵文片斷^{④⑥}。同一時期，和闐(Khotan)和克什噶爾的抄本亦送至 A. F. R. 荷蘭(A. F. R. Hoernle, 1841-1918)那裏，荷氏在「孟加拉亞洲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中曾有報告^{④⑦}。特別重要的是用平常語(Prākṛit, 即俗語)寫的「法句經」(Dharmapada)抄本的發現。這一抄本部份由杜魯愛爾·狄軒恩(Dutrneil de Rhins)和格連納(Grenard)於一八九二年在和闐獲得，另一部份則由彼得洛夫斯基在一八九七年送給奧頓堡，奧頓堡即複製及轉錄其中的一頁發表。翌年，辛納亦將在

巴黎的片斷音譯^{④⑧}。所有片斷的決定版延至一九六二年始印出(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它有一份相當完備的文獻目錄，所有有關此書源典的參考資料都包括在內。

中亞細亞這些抄本及其他資料的發現，結果導致多次中亞探險隊的組成：有三次探險是由英國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2-1943)率領，分別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一，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和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德國人有四次：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由阿爾拔古隆衛德(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和紀柯·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率領，第二次是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由溫·歷柯克(Von Le Coq, 1860-1930)率領。第三次是一九〇五—一九〇七由歷柯克及吉隆衛德率領，第四次是一九一三—一九一四，仍由歷柯克率領；法國探險隊一次，是在一九〇六—一九〇八由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率領；日本三次，分別在一九〇二—一九〇四，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俄國亦有三次，第一次在一八九八，由祈利文茲率領，第二及第三次分別在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由些爾傑·奧頓堡率領。此外，還有一些探險隊，積克·塔斯(Jack A. Dabbs)書中即有敘述^{④⑨}，但上述這些對佛教研究來說是最重要的。經過這些探險之後，結果，數量巨大的以各種語文如梵文、龜茲文、阿耆尼文(Agnéan)即焉耆文——譯者)、和闐文、突厥文(Sogdian)、回紇文(Uigur)、西藏文和中文寫成的佛教抄本即分別到達巴黎、倫敦、柏林、彼得堡、和日本。有關中亞研究的文獻目錄已經在 Monumenta Serindica (Kyoto, 1958)的第一卷中出版(pp. 53-87)。此外，華德舒密特(Waldschmidt)的「土耳其斯坦出土的梵文抄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I, Wiesbaden, 1965)一書中會列出所有自一九〇四—一九六四德國學者所發表的梵文斷簡(pp. xxvi-xxxii, 一九六四—一九七〇者，參看 vol. III, 1971, pp. 275-276)。班納·普利(Bernard Pully)亦列出伯希和携歸的梵文斷簡的出版情形(見「亞細亞高原的梵

文斷簡「Fragments Sanskrits de Haute Asie (Mission Pelliot), JA, 1965, pp. 83-121)。據我所知，在倫敦，列寧格勒，日本的梵文斷簡並無出版目錄，但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前出版的——可以在山田龍城的「梵語佛典之諸文獻」(kyoto, 1959)中找到。關於龜茲文和阿耆尼文部份，則須參看安尼斯特·史溫特拿(Ernst Schwentner)的 Tocharische Bibliographie 1890-1958 (Berlin, 1959)。關於突厥文的，則為 M. J. 德拉斯頓 (M. J. Dresden) 的 Bibliographia Sogdica Concisa (Jaarbericht No. 8 van het voorzatisch-Egyptisch Gezelschap Ex Oriente Lux, 1942, pp. 729-734)。關於和闐文部分，除德拉斯頓的 Introductio ad linguam hvatanicam (前引書, No. 9, 1944, pp. 200-206) 外，尚有 J. G. 紀辛 (L. G. Gergenber) 的 Xotano-Sakskij jazgk (Moskva, 1965, pp. 16-29)。關於回紇文部份，可以參看魯道夫·雷文圖 (Rudolf Loewenthal) 的「中亞土耳其語系及其文獻」(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Central Asia, 's Gravenhag, 1957) 和我所作的補充 (11J, II, 1958, p. 81)。至於巴黎和倫敦的藏文抄本，亦已由馬賽爾·拉努 (Marcelle Lalou) ⑤⑥，和蒲仙 ⑤⑦ 兩人編目。但有關於原典出版的目錄尚無。

- ④④ 參看 S. F. Oldenburg, Pamjati Nikolaja Fedorovica Petrovskogo 1837-1908, Zap. Vost. Otd. R. Arch. Obsč., XX, 1910, pp. 01-08.
- ④⑤ S. F. Oldenburg, Kašgarskaja rukopis N. F. Petrovskogo, ZVORAO, VII, 1892, pp. 81-82; E. Leumann, 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ren Literatursprachen Mittelasiens Mémoires de l'Acad. imp. des sc. de St.-p., XIIIe série, Tome IV, No, 8, 28pp., 2pl.
- ④⑥ Otryvki kašgarskix sanskritskix rukopisej iz sobranija N. F. Petrovskogo, ZVORAO, VIII, 1894, pp. 47-67; VI, 1899, pp. 207-267; XV, 1902-3, pp. 0113-0122; K kašgarskim bud-dijskim tekstam, ibid., VIII, 1894, pp. 151-153; Ešče po povodu kašgarskix tekstov, ibid., pp. 349-351.
- ④⑦ The Weber Manuscripts, JASB, 62, Part I, 1893, pp. 1-40;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ibid., 66, part I, 1897, pp. 213-260;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JASB, 68, part I. Extranumber Ns. 1, 1899 and JASB, 70, part I, Extranumber I, 1901.

④⑧ S. F. Oldenburg, Predvaritel'naja zametka o buddijskoj rukopisi, napisannoj pisimenami kharoštī, Sanktpetersburg, 1897; E. Senart, Le manuscrit kharoštī du Dharmapada: les fragments Dutreuil de Rhins JA, 1898, II, pp. 193-308, 545-548.

④⑨ Jack A.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1963; Chap. V. The Archaeological Period: 1838 to Stein's First Expedition; Chap. VI. The Archaeological Period 1901-1914.

④⑩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nen-bouang, I, Paris, 1939, II, 1950; III, 1961.

④⑪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1962.

(未完待續)

謝 鳴 款

李駱慧遜居士	港幣	50.00元
Mr. Y. Chan (加幣67元)	港幣	270.00元
鍾伶餘堂	港幣	150.00元
吳寬性老居士	港幣	200.00元
張沈覺善居士	港幣	100.00元
潘周珮璋居士	港幣	100.00元
謝振剛居士	港幣	100.00元
陳志偉居士	港幣	200.00元
梁志偉居士	港幣	100.00元
樂渡法師 (美金20元)	港幣	100.00元
南加中華佛教會	港幣	50.00元
了知法師	港幣	40.00元
樂吟觀居士	港幣	100.00元
修福法師	港幣	100.00元
演培法師	港幣	180.00元
伍稼青居士	港幣	135.00元
妙法寺	港幣	3,160.40元
總計	港幣	5,135.40元

八十三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5,135.4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777.00元
總計	港幣	5,912.4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3,277.30元
稿費	港幣	1,320.00元
郵費	港幣	715.10元
什費	港幣	600.00元
總計	港幣	5,912.4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啟